

# 维持 可持

20年以前，一个国际委员会创造了一个短语，激发了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的立场是什么呢？

20年以前，联合国要求我建立并担任其主席的国际委员会向你们提出它根据多年努力工作、学习和共同体验得出的结论。

这本朴实无华的书的名称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发现它很适合读，因为它研究的只不过是我们的共同生存，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我们的历史到了这样的时刻，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共同分享这个世界，除非我们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适应这个星球的长期承载能力，否则我们就冒着超越限制的风险。然而在我们有限的资源的过度使用中，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显然只占很小的份额。不平等的机会和不平等的分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满足当代人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它们需要能力的挑战，被委员会归结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这种新的政治概念包括了在几代人内和几代人之间的平等和公正。

委员会按一揽子方案编写这份报告。我们讨论国际经济任务，同样我们也讨论人口和教育、粮食安全、物种和生态系统、能源、工业和城市的挑战、海洋、空间和南极洲问题。我们讨论我们是多么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普遍适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来组织国际社会。

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从根本上减少了地方性贫困，包括一般性贫困和赤贫，我们才可以谈到进展；只有彻底消除了贫困，我们才可以宣告成功。贫

困是人类脸上的一块伤痕：贫困降低了人民素质，贫困恶化了环境。

在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工业灾难和核事故灾难、对臭氧层不断加剧的威胁、饥荒、干旱和传染病增加。令许多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没有描绘一幅毁灭或失败的图画，而是提出一个强烈希望的信息。虽然人类无疑拥有破坏本身和生物圈之间全球平衡的能力，但是它从未拥有更大的能力和可能性来拯救这种脆弱关系。世界接受这一挑战，并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峰会。

我们感受了开罗人口会议的高期望，并且在北京妇女大会上我们聆听了无数需要自由和平等的声音。我们因这些成功而高兴，并且为在京都的失败而悲伤。

我们从那些地方和许多的集会转到纽约，我们在这里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连同其他发展目标将成为我们的导航灯塔。在约翰内斯堡我们遭受挫折并表现急躁，然而在2002年世界峰会上还是设法推动问题向前发展。

诚然，曾有几个低潮和自我满足的时期，然而幸亏20年以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正在许多领域取得进展。贫困仍然是我们最严重的挑战。我们有60亿人民共同生存在我们脆弱的地球上，许多人严重缺乏粮食、水和必要的安全。幸而许多国家经历着活跃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反，许多非洲国家发觉自己处在一

# 续发 展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个负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痛苦地生活在世界经济的边缘。

然而亿万人民被遗弃在绝望的山谷爬上正义和繁荣的高地，而且不仅仅是在亚洲。这是我们一生，或许是在所有的历史中，最重要的福利和繁荣的扩展。

在许多国家和许多文化中，女孩和妇女仍然受到歧视和非人待遇，而且每况愈下。然而趋势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不仅仅是在女孩受教育方面。哪些国家正在经历着最高的增长率？是那些实行平等机会的国家。性别平等意味着一种竞争优势。

在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喝上安全饮用水。使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可能在全世界达到，然而在亚洲比在非洲更加成功。享受基本卫生条件的人也在不断增加，然而还没有快到在2015年实现使无法获得卫生条件的人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的程度。水荒、水污染和过度使用地下水资源仍然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生存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比气候变化的威胁更加紧迫。

在我们回顾的五年期间，我有幸执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我接受了一项新的职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我成为他的三个气候变化特使之一。我称赞他是因为他从任期开始就如此强有力的强调气候问题。他的领导地位是重要的，而我们许多人将支持他和拥护他。

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挑战可以在若干部门和若干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许多诸如此类的挑战可以由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加以解决。然而气候变化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无人可以躲避它。没有人可以买到保护。

有关二氧化碳浓度对全球气候的物理效应的学说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20年以前，世界委员会



“怀疑情况的严重性是不负责任、不顾后果和非常不道德的：诊断的时间已经结束，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强调了1985年在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主持下在奥地利菲拉赫集会的30个国家的科学家的结论。这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先驱说明：人为的气候变化是可能的和似乎可信的。

在1988年多伦多气候会议上，我借机提出应制定一项国际公约来处理科学技术转让和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具体措施。4年以后我们签署了那个公约。

今天又有什么新变化呢？新变化是消除了怀疑。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报告是明确的，Stern的报告（由英国N.Stern编写）也是如此。怀疑情况的严重性是不负责任、不顾后果和非常不道德的：诊断的时间已经结束，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工业化国家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是我们把

污染物装满大气。我们必须承担最大的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责任。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斗争并克服一些障碍。

我来强调三个因素。首先，在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很久以后才能感觉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它没有可确定的边界。甚至最大的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缺乏信任的牵制。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国家集团内部缺乏信任。

许多工业化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做而且做得太少。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工业化国家没有履行其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承诺。许多国家只关心成本和竞争力，而许多国家不愿承担另一些国家将逃避的义务。

虽然我们前进中必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盲目或对这个事业失去信心。我们必须建立信任和发现共同点。京都议定书只对占当前全球排放量30%左右的国家提出具体义务。我们必须对新的协定树立更高的雄心。这将要求产生最高排放量的国家参加，不仅仅是美国，而且也包括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也将必须做出具体的减排承诺。

我自己的国家挪威政府做出了新的承诺。首先，超过了京都承诺：在2012年之前的期间内把它的减排量比它的京都义务再加大10%以上。其次，到2020年挪威将减排相当于我们1990年排放量30%的温室气体。

但是这还不够。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必须更加急剧地减少，富国需要成为碳中性的。

因而，第三个承诺是到2050年挪威将承诺减少相当于我们所有排放量10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些目标将会通过在挪威执行重大的措施和利用京都机制实现。挪威的措施包括建设世界上第一座装有全面碳捕获和存储系统的燃气电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会掌握洁净烧煤电厂的技术，并且其成本具有商业吸引力。诸如此类技术不仅对我们的气候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给我们许多其他当地和地区性的好处，至少在公共卫生方面。

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国际上使用的碳捕获之类解决办法可以产生一万亿美国的交易。此类项目将转让技术，并将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使大量的资金从新的和附加的经济来源流到发展中国家。简而言之，在鼓励改变和投资的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发展中国家有权发展：别搞错，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应该要求发展中国家减缓它们对繁荣的攀登。但是它们必须能够跳过许多国家从前经历过的污染严重的发展阶段。

今天，我认为我们站在一个新的绿色经济的门槛上：这是一种可以消除世界贫困和拯救气候的低碳经济。这是我们的要求，并且它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必须在一个广阔的战线上前进：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改进农业和林业的作法，而重点是适应，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的岛国。

为了取得实际的进展，我们必须根据一个扩大的清洁发展机制范围开发一个真实的全球碳市场。只有当财政部长和首席财务执行官因为不得不为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支付而要求削减排放量的时候，真正的巨大投资才会出现！巨大的成就经常开始于一种似乎是近于疯狂的景象，而许多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最初受到轻视。在开发第一个电灯泡上花多少钱合适呢？

大约4万~7万年以前人类开始与生物圈作斗争。200年以前我们似乎能驾驭它。结果我们像是魔术师的徒弟。2007年将是决定性的，那些相信世界将恢复往常面貌的政治领导人将必须与他们的选民有一次坦诚的会面。当前我们需要开始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体制。你可能认为我们可能失败，但是我认为我们不会，因为失败不是一个选项。

---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特使。本文是她根据其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第15次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写成的。